

# 中共政權今年面臨的困擾問題

曹 伯 一

共產制度在中國大陸的強迫實驗，對中國人產生無比困擾，對中共政權而言，同樣存在着極大困擾，這真是一個困擾的社會型態。在今年，中共必須面對的麻煩，至少包括下述這些問題。

## 一、退休與整風

中共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提出「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決定」，意欲解決冗員過多問題。一面成立「幹部退休離休管理處」，統籌處理幹部退休離休事宜。並進一步推出保證，表示對離退休等老幹部的尊重與照顧，以誘使老幹部接受離退休要求。

當前大陸各地在開展此項工作中，所採取的相應措施主要是：成立退休幹部管理機構，納入當地政權組織控制與掌握；並給予離休退休幹部在政治上、生活上所謂「兩個一樣」、「四個不變」、「四個優先」，以及在醫療、住房、交通、物資供應等方面的優待，以安定各級幹部心理，藉此全面誘逼老幹部「退職讓權」。

長期以來中共黨員幹部普遍存在「有職就有權，有權就有一切」的特權思想，將權力視為利祿的憑藉，導致一般幹部「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的現象。一九八〇年中共提出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後，老幹部那畏懼喪權失利，戀權戀位的心態益形加劇，不但影響幹部年輕化政策的推行，甚至精簡機構裁汰冗員亦受到嚴重的阻礙。二月六日「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均以重要篇幅呼籲尊敬離休人員並給予特權。

中共在中央及地方極力勸促老幹部離退休，固然在求實現「幹部年

輕化」。而更重要的，是圖藉精簡機構，將包括林江殘餘在內的「文革」勢力一舉驅出於組織以外，這是鄧小平另一整肅手法。

目前奪權和保權的尖銳鬭爭，正在中央和地方縱深展開，這不但是鄧派集團面臨一次嚴重考驗，同時此一情況，也是大陸社會另一次動亂的醞釀，這一趨勢是值得注視的。

## 二、農村土地問題

前年九月中正式宣佈在農村實施「生產責任制」，旨在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但是引起了農村新的情勢，發生分光、拆光社隊農機、農具、倉庫、耕牛等「集體財產」事件外，「土地歸屬」問題更為突出。

農民認為「雙包」就是「分田單幹」，普遍存有「過去是分地主的地，現在是分集體的田」的心理，要求「土地回老家」、「認祖業地」，並出現土地買賣、出租及在耕地上建房、造墳等現象，嚴重威脅到土地「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

中共「國務院」於去年四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建房侵佔集體耕地的緊急通知」，強調農村社隊的土地都歸集體所有，分配社員的宅基地、自留地、承包的耕地，社員只有使用權，不准買賣、轉讓、出租，也不准在責任地上建房、葬墳、開礦等。各地紛紛制定「保護集體財產、嚴禁侵佔集體耕地」的相關規定，並印發佈告要求一致遵行。

自「農村生產責任制」在前年九月全面實施，對挽救大陸農業生產產生了部份作用，但亦出現許多副作用。農村實施「雙包」責任制，農民所

獲利益較以前稍增加，但「分田單幹」、「土地回老家」、「認祖業地」的要求也隨之而來。此等要求牽扯到土地歸屬問題，嚴重地威脅到共產集體經濟制度。

中共一再聲明「包產不是分田單幹」，但各地農民對土地之分奪却極感興趣，不僅要分生產隊現有的田，並糾合社隊幹部要分各農場的田，致頻頻發生土地糾紛，甚至引起流血鬥鬥及殺死農場職工事件，使土地問題更形複雜。

土地是農業的主要生產資料，大陸農民紛紛提出分田要求，當然引起共黨政權恐慌。「農業部」於去年十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在北平召開「全國農業工作會議」時，即揭發今後農業生產仍將堅持「三不變」原則，其中之一即是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主要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制「長期不變」。十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亦發表「堅持土地公有制，堅持集體化方向」的評論，由此見土地問題已成爲當前大陸八億農民與共黨政權利益對立的焦點。

當前大陸土地問題不祇是所有權的歸屬問題，更嚴重的是耕地面積逐年減少。二十年前中共公佈耕地面積，爲十六億餘畝，目前連同新開墾的耕地在內，僅有十四億九千餘萬畝。中共坦承二十年來減少耕地逾四億三千萬畝，平均每年減少二千萬畝，此種情況再持續下去，今後大陸上可耕地面積將益形減少，土地問題將會更加尖銳。

### 三、人口不斷膨脹

今年七月一日，中共將舉行人口普查，以瞭解人口確數。中共於去年初宣佈人口數爲九億八千萬，最近宣佈人口已突破十億大關。人口最多省份四川省，實施新農業政策後，農戶都想多生幾個孩子，用以增加勞動力改善生活，所以人口出生率已回升。現在情況是生育率提高，相對地就學率 and 就業率下降。

趙紫陽在報告中說：「……聽任人口繼續大量增長，從而既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也不能很好進行經濟、國防的建設。……」。自推行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以後，原有一些控制人口增長的措施，已不能適應新的形

勢，部份地區出現了出生率回升的趨勢。「顯見中共對人口膨脹壓制效果已經下降。」

中國大陸目前的人口，幾乎相等於三個美國，或者六個日本；是美國、蘇俄及西歐各國人口合起來的總和。佔全世界人口二五%，現在仍以每年千分之一·七增長率增加中，每年出生人口近二千萬。大陸人口居世界第一，國民所得却落在世界第一二〇位，人多與貧窮相互影響，造成惡性循環，爲中共經濟帶來無比的困難。中共如不能將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至零，則所有經濟建設成果，除提供十億人口消費外，還須另覓新的生產資料，來解決每年近二千萬新出生人口的衣、食、住、行、教育、醫藥以及就業等等需求。簡言之，中共現有低微的經濟成長，已爲現有和日增人口所吞噬抵銷，顯見問題的嚴重性。

### 四、社會治安情況

去年十二月七日，江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黃火青（「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分別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彙報自前年九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以來，各級「法院」和「檢察機關」的工作概況。其中所透露與社會治安有關狀況如次：

（一）從一九八〇年十月至一九八一年九月，地方各級「法院」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二十萬九千六百餘件，二審刑事案件四萬一千餘件；「最高法院」審結刑事上訴、再審案件六百三十二件。其中各級「法院」判處殺人、搶劫、強姦、爆炸、放火等，對社會治安危害很大的現行重大刑事案件三萬九千餘件，還懲處了一批「特務」、「間諜」等「反革命犯罪分子」，以及一批重大的走私、投機倒把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犯罪分子」。

（二）從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一年九月，地方各級「法院」共處理一審民事案件，計六十三萬二千餘件（其中婚姻家庭糾紛三十六萬五千餘件，財產權益糾紛二十六萬七千餘件），二審民事案件四萬餘件；「最高法院」審結民事上訴、再審案件廿一件。

近年來，民事收案逐漸大量上升；一九七九年比一九七八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九點六，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七九年上升百分之四十五，一九八一年

上半年比一九八〇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二十七。民事收案中，不僅婚姻家庭、繼承、房屋、宅基地、損害賠償等案件顯著增多，而且新增了許多因不履行合同和為爭山林、水利、農具、耕畜、肥料而發生的案件。

〔各級「法院」在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和問題，主要表现在：「對少數刑事案件的判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出現了違反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現象，如有的事實不清，有的定罪不準，有的量刑失輕失重，有的違反審判程序和制度；有的人民法院的負責人對加強民事審判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加上案件增多，審判力量不足，以致造成了不少民事積案；經濟審判工作剛剛開始，對這方面的問題調查研究、總結經驗還做得不夠。」

從以上內容看來，問題很多，社會秩序並不穩定，各地情況也不平衡，尤其是在「經濟調整」期間，經濟上的違法犯罪也很突出。

前年九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透露，前年上半年，各級「檢察機關」批准逮捕，並提起公訴的各類刑事案犯八萬四千多人，其中重大現行罪犯佔百分之五十多；所起訴的案件，「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佔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這次會議則透露，前年十月至去年九月，僅「地方法院」即審結一審刑事案件廿萬九千六百餘件，各級「法院」共判處重大刑事案件三萬九千餘件；去年一至九月，各級「檢察機關」批准逮捕並提起公訴的人犯中，經「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佔法院已審結數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七。將以上兩次會議所公布的有關數字相互對照，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以來，大陸社會治安情況一直處於惡化狀態。

除了刑事案件外，前年一月至八月底，廿四個省、市、區「檢察機關」共受理經濟和法紀犯罪案件一萬多起。去年一至九月，各級「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經濟犯罪案件三萬一千多件，法紀犯罪案件一萬六千多件，說明違法亂紀、經濟犯罪情況趨向嚴重。

### 五、「傷痕文學」如何退阻

「傷痕文學」是中共文革後的一種新的文學型態，主要內容是暴露文革期間人民所遭受到的迫害。

鄧小平曾經鼓勵這種「傷痕文學」出刊，目的是用來打擊四人幫，作為政治鬥爭方式之一。

一九七八年八月復旦大學學生盧新華，以「傷痕」為題，最先揭批了「文革」造成的一個家庭悲劇，由是產生了「傷痕文學」、「暴露文學」。經逐漸演變，「暴露」的內容已愈來愈擴展，現在中國大陸中國人，已利用種種文學型態，表達人民對中共政權的厭倦與憎惡。

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男主角凌晨光在逃亡中饑寒至死，其女發為浩嘆說：「爸爸！你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是這個國家愛你嗎？」這就暴露了中共與人民之間的鴻溝。

沙葉新、李守成、姚明德合編的「假如我是真的」話劇，男主角老張在法庭上喊出：「錯就錯在我是個假的，假如我是真的，真的是老張或其他首長的兒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會是完全合法的。」揭發了中共高幹無法無天的特權。

張秋山的詩：「既然是同志、戰友同胞，何必要我設下圈套？既然你打算讓我戴上鎖鑊，又何必面帶微笑？既然你準備從我背後插刀，又何必把我擁抱？你們在我嘴上貼滿了封條，我們在自己的腦袋上掛滿了問號！啊！真正的同志！戰友！同胞！為什麼不像星星那樣互相照耀。」中共醜惡的真面目，殘酷鬥爭特性，在此暴露無遺。

其他如：葉文福的長詩：「將軍！不能這樣做！」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劉心武的「沒功夫嘆息」，玉安的「假如他還活著」，祖慰的「啊！父老兄弟」，孫靜軒的長詩：「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等等，都使得中國大陸震撼，使中南海的頭頭們顫抖。

這種發展趨向，宣洩了人民的怨憤，也使共黨有所警惕，所以鄧小平在「全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特別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黨的領導。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自由化、搞無政府狀態。」又強調：「黨員作家、藝術家、思想理論工作者，先要遵守黨的紀律。」

鄧小平提出了這個界限，也採取了行動，發出了「中發」字七、九號文件後，對文藝工作者捉的捉，關的關，今日大陸的文藝創作，落得只有「描紅」的份兒了。但是問題並未從「根」解決，文藝作品祇是表達的形式而已，解決問題的關鍵，顯然並不在形式。